



洞口文史

第六辑

洞口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二〇〇四年十月

洞口文史

第六辑

洞口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二〇〇四年十月

序

洞口县政协主席 刘千苟

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民主被践踏，法制遭破坏，人身受侮辱，权利被剥夺；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反革命事件，揪斗了一批又一批干部群众，造反夺权之声不绝于耳，打砸抢抄之风甚嚣尘上……，十年动乱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英勇斗争。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走上了由乱到治的历史进程。

春风秋雨，日月穿梭。对于发生在三十多年以前的那场动乱，亲历者也许记忆犹新，而年轻一代则难以想象。本着“资政、存史、团结、育人”的方针，洞口县政协编辑了《洞口文史》第六辑——洞口县“文革”史料专辑，通过亲历者的回忆，真实再现当年的历史面貌。尽管叙述者角度不同，深度不一，但所涉及面之广泛，选材之准确，情节之真实，堪称为洞口县“文革”史

的一个缩影。足可反思既往，昭示未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历过风雨和苦难的人们更加珍惜阳光和幸福。今天，我们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切实保障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开创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宏伟的事业，谱写人民共和国最辉煌的篇章。让我们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洞口文史》第六辑编委

成员名单

顾问：黄先球 袁再雄

主任：刘千苟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瑞和	刘兴坤	向光柏
李迪享	肖春生	肖荣贵
欧阳松柏	杨子仁	杨宝生
陈哲平	周玉宝	曾令柏
曾值桃	雷晖平	

主编：刘千苟

副主编：曾令柏 刘兴坤

责任编辑：向光柏 欧阳松柏 王德友

印张: 10 850×1168×32 开

印数：1-2000

字数：20万

湘邵新出准字 (2004) 第 35 号

洞口金源教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装订

目 录

洞口文化大革命的大略演进过程	王道钦 曾广松 刘德生(1)
关于公开《给县委常委的一封信》的声明	(15)
文化大革命中的舆论宣传	刘德生(25)
变味的“五·七”干校	刘德生(30)
文革中的经历和感受	王道钦(36)
当桔子红了的时候	邓 华(43)
我被“湘江风雷”造反派抓走的前前后后	肖连山(49)
母剪鞋样女遭灾	林松年 向元瑞(52)
一张大字报	刘华安(53)
对“五·七”干校的追记	曾毓成(54)
忆“五·七”干校斗批改	肖连山(60)
往事琐记	赵季良(62)
走资派苦衷掠影	尹全朴(71)
刘世芳惨死的前前后后	曾毓成(75)

下放瑶乡的回忆	黄永斌 雷连生(79)
浅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蒋子棠(82)
洞口县一打三反的回忆	向本槐(102)
洞口县批林批孔的概况	向本槐(104)
洞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件大事	曾广洋(107)
造反派的甜辣苦酸	陈湘波(112)
回首当年	雷卓璋(116)
我在“文革”中的遭遇	雷启光(119)
我是怎样当上“铁杆保皇派”的	刘穆坤(123)
“刮台风”见闻录	曾毓成(127)
反动小集团的扩大化	曾毓成(129)
文化大革命制造出来的冤案“益民党”	刘穆坤(133)
人间有真情	雷卓璋(137)
少年时期	向光柏(139)
十年动乱中的社会经济	陈湘波(144)
团结一致 排除干扰 艰苦奋斗 大办工业	刘华安(151)
农业机械厂战备工作记实	赵季良(154)
学大庆结硕果	赵季良(156)
艰苦奋斗修公路 自力更生兴运输	谢光耀 曾令钧(159)
第一座社办公路桥	曾令钧(168)

关于抢修洞口大桥的回忆	王道钦(171)
洞口县率先开通农村短途客班车	曾令钧(179)
两万民兵参加湘黔、枝柳铁路大会战 ...	肖信常 唐古石(184)
风风火火忙支前	唐古石 肖信常(199)
我与湘黔线	雷连生(206)
忆战备二、三事	曾毓成(209)
住点四百天,造田二百亩	肖信常(215)
难忘三事	赵季良(218)
“文革”期间的对外贸易	向 敏(222)
艰苦奋斗办广播 全心全意为人民	林汉阳(223)
忆供销社在“十年文革”中的二、三事	曾广炳 王槐禹 向元瑞(230)
十年动乱片断谈	雷连生(233)
“文革”期间学校运转片断回忆录	廖雨生(236)
文革期间的八个“样板”戏	尹显文(240)
忆“文革”时期的广播宣传	林汉阳(244)
省城医务人员下乡来	严建斌(251)
荒唐往事 不笑也罢	佚 名(255)
文革辞典录	贾奕甄(257)
历史在这里沉思	后 记(260)

洞口文化大革命的大略演进过程

(王道钦 曾广松 刘德生三人回忆调查讨论 刘德生执笔)

文化大革命，已作为它的发动者毛泽东同志的一个严重错误，写进了党的历史决议，成了反面教材。但它对人民心灵的震撼，却是使人长期难忘。为了有利于人民重温历史，牢记教训，简略回顾一下它在本地的具体演进情况，还是很有意义的。

根据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表现特点，我们认为洞口的文化大革命可分为以下四个小的阶段：

一、“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衔接

邵阳地委从邵东、双峰、新化三县和地直机关抽调 3200 多名干部，组成“洞口县社教工作总分团”，于 1965 年 8 月 30 日进驻洞口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叫“四清”运动）。与此同时，由江青一手策划、姚文化主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讨论，以及由《北京日报》发端，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的批判已在进行，积极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作着舆论准备。

社教运动原定一年，66 年秋季结束。正当运动进入到中后期的干制改革和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

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社教”马上转入文化大革命。5月19日,县属机关干部职工和各界人士在县城举行大规模集会,声讨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随后全县开展了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群众运动。从6月1日起,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夺权后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把《5·16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进行点火,使运动迅速升温。这时,县委根据省地委指示作出部署,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要批判本地的“小邓拓”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全县迅速掀起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高潮。使文化教育界一些有名望但出身差,社会关系复杂,又有某些政治历史问题的知名人士受到很大冲击,有的被点名出了大字报、勒令交代问题,有的被揪斗挨打,由于全国性的政治风暴黑云压城,运动来势很猛,一中的向实、文教科的林卫华、水利局杨维喜、印刷厂干部尹桂先、饮食服务公司经理吴素贞等人,感到在劫难逃,前途绝望,受惊吓相继自杀。

6月3日至10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5·16通知》。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学习,为了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县委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王荣春任组长,下设办公室,作为县委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办事机构,各单位都参照成立“文化革命小组”,负责处理文化革命的日常工作,文革小组成员一般都是单位“四清”职代会成员。由于学校动起来较早,县委对一、二、三中等几所中学还派出了工作组,7月21日至8月20日,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交接阶段,按照省委有关教师清队的指示,全县共批准清理回家教师215人,这些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首批牺牲品。

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很快以传单形式传入洞口,各校纷纷建立各种名称的“红卫兵”和“红小兵”组织,揭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批走资派,大批学生走向街头、农村、横扫“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使许多文物古迹及收藏经典遭到破坏,学校都由文革小组主持工作,教学活动被迫基本停止,学校秩序一片混乱,学生打老师、抄老师家的现象屡有发生。这段时间,在长沙等地读书的学生也回乡进入学校机关串连点火,他们联系的多是各单位文革小组成员,动员人民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革命儿混蛋”的“血统论”和“化成分论”成为运动早期划类排队、凝聚队伍的时髦口号,街上不时出现敲着锣押着脖子上吊着牌子的所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游行队伍。出身差,社会关系复杂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成了惊弓之鸟,人人自危,毛主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等语录,被革命群众当作战斗口号和护身符,背得烂熟,遇到问题和攻击对象,他们张口就念着,并可施之以不受任何约束的行动,一个个都表现得至高无上,无比冲动。

由于人民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自下而上自发起来的群众运动不理解,这时在洞口镇街头显目的墙壁上出现了“革命的欢迎,不革命的滚蛋,反革命的镇压”的标语,和一张标题为

《外地学生为什么来洞口到处游说》的大字报，语言尖刻，把矛头直接指向外来串连的学生红卫兵，于是在社会上很快引发了两种不同观点，形成街谈巷议，甚至群众性辩论。因此，串连学生和造反派认为洞口阶级斗争复杂，保守势力大，逼着县委领导表态，提出要进行追查，气氛一下紧张起来。8月29日，县人委机关文革小组乘势写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守派——致洞口县委的公开信》的大字报，接着，县人行部分干部也写出《向洞口县资本主义老巢初增科、李弘浩开炮》的大字报，拉开了直接揭县委所谓阶级斗争盖子的序幕，接着其他一些县属单位也积极写出大字报，揭发县委和单位当权派的问题。从此，全县各地干部、职工、青年学生等纷纷投入运动，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党政机关开始受到冲击，少数单位的当权派被揪斗，挨打。9月10日，县文革办工作人员在县人行门前劝解互相争辩的群众，也受到造反派的质问围攻。

当大多数群众响应毛主席号召，刚刚投入运动时，省委书记张平化在9月24日作了个报告，发出了对造反派进行反击的号令。报告一传达下来，对照省地情况，县委认为9月上中旬洞口县少数干部职工和红卫兵上街游行、贴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负责人的行为，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右派分子”。于是指示文革办搜集整理材料，仿照省地的模式编写揭发传单，制造反击舆论，部署在全县开展一场抓“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运动。10月10日，县委在县城召开四级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传达张平化的“9·24”报告精神，号召大张旗鼓开展对“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反击。11日，县委在县城设立4个会场，组织召开有6000多人参加的大会，批判斗争4名前段支持革命群众运动的领导干部，即县人委劳动科长孙洪升、财政局长尹华广、银行行长张玉琪、

邮电局副局长宾都生。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会后，县直许多局、行、社和区、镇也将原来给党委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的人打成“反党分子”或“右派分子”。上述四个单位的造反派也成了打击重点，许多人都受到大字报点名批判，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10月中旬，县委还把这些受过围攻批判的干部统一组织到农村劳动，使各单位的文化革命一时变得平静起来。

张平化的“9·24”报告出来后，也受到各地造反派的强烈抵制。后来，省委被迫很快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通知各地“要坚决迅速地做好平反工作”。县委接到通知后，分别召开了县城机关、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大会和全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初增科代表县委作公开检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宣布给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因支持串连学生和揭批单位领导问题被批判的人彻底平反。要号召所有革命同志加强团结，继续揭发批判县委所犯的错误，使机关的群众运动又重新恢复发展起来。

随着毛主席多次在首都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全国出现了“红卫兵”步行大串连高潮，每天路过洞口歇宿的红卫兵多的达数百人。为了搞好红卫兵的接待工作，县委抽调几十名干部并安排专门场地，在县城、石江、竹市、高沙等地设立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各地赴京师生。11月上旬，县委、县人委根据中央9月5日发出的关于组织大中学校师生代表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全县组织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现实表现都很好的中学师生代表300多人，由县委副书记禹光卿和宣传部长尹文安带队，准备赴京。到达邵阳火车站后，因安排的火车发生变故而返回。

1967年元月中旬，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省城召开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批判省委张平化等领导人。县城一

批因张平化“9·24”报告受过压的群众代表组成代表团，赴长沙参加这个大会，地委副书记兼洞口县委书记初增科、副书记王荣春也随代表赴会接受教育。会议期间，代表团酝酿讨论了筹建群众组织“洞口红色造反者总司令部”（简称“红总部”）的有关问题。代表团一回县就立即建立了这个组织，有联系的各单位以受压群众为首成立“红造”纵队，县人委机关纵队简称“红司部”。由于这个组织的骨干多是各单位“四清”职代会成员或积极分子，有一定的活动能量和影响，“红总部”成立后很快就形成一支占压倒优势的造反派力量，左右着县城和区社的运动形势。嗣后，以“红总部”为首的各单位造反派组织纷纷联合起来揭发批判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使县委机关的一般干部群众处于尴尬境地，为了表明自己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立场，不同名称的群众组织在县委机关也陆续出现。前段被出过大字报、挨过整的一些群众和所在组织以及几个行动过激的造反派组织，以查“黑材料”为名发起新的冲击，他们不容申辩地搜查和封闭了一些机关单位和厂矿学校的办公室，并以“窝藏黑材料”，充当“打手”、“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中央给造反派平反的指示”等罪名，对县委和单位领导任意围攻，揪斗甚至抄家，并硬逼着县委领导签字，将30多名共产党员开除出党。还有人对公检法机关进行冲击，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喊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局副局长肖逢吉、竹市区文教支部书记罗群华等人因威逼气吓，分别跳塔跳河自杀。据调查，全县直接受文化革命影响而死亡数共124人，批斗游行不断升级，县委对运动的领导失控，党政机关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月下旬，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支左”的决定发表后，洞口人武部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群众组织中，

当时主要支持“红总部”，利用它的影响力来稳定机关的局势。

洞口群众组织派系的发展，直接受省市群众组织派系的影响，当时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是湘运、邮电和高校学生，长沙“高司”派这一块主要影响了机关和学校，与“红总部”联系密切，在学生大串连高潮中，厂矿企业、下放青年和城镇居民中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受省革“湘江风雷”等群众组织的影响，也迅速发展起来，其中发展快，影响大的是洞口“湘江风雷”。他们开始主要在基层“造反”，行动激烈，对社会产生的冲击力强，在这种情况下，石江等地组织“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后转“农联”），与“湘江风雷”抗衡对峙，多次发生冲突事件，使运动局面难以控制，2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造反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县人武部接到通知后，连夜对“湘江风雷”的骨干成员进行抓捕审查，使该组织暂时被瓦解。

“湘江风雷”被取缔后，“红总部”独占鳌头，经过组织策划，2月上旬在县城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上由红总部负责人传达长沙高校红卫兵批斗省委领导执行“资反路线”的经验，号召大揭洞口县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盖子，大会公开批斗初增科和王荣春，并提出了“打倒初王”的口号，接着，县城组织了“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大游行，造反派积极进行着夺权的准备，全县进一步陷入无政府状态。

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秩序，3月4日至6日，县人武部主持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会上成立了由军队干部吴振东、张学禄、杜景芳和地方干部张光荣、刘观清、禹光卿等人组成的“洞口县生产领导小组”（后改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生产指挥部”），取代县委、县工委的部分职权，主持全县的经济工作。不久，江青一伙炮制的批“二月逆流”打击老干部的歪风刮了下来，洞口的一些造反派组织也跟着掀起

批“二月逆流”的恶浪，把斗争矛头全面指向领导干部，层层喊出打倒“洞老谭”的口号。4月28日，造反派在县人民医院会场批斗了著名作家周立波和康濯，不久，又批斗了邵阳军分区司令员老红军尹才生同志，在此后的几个月，围绕着“湘江风雷”是否应该平反和对个别领导干部的不同态度问题，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日趋激烈，在省地市造反派组织派系斗争的影响下，县城交通部门的部分群众和从一些组织中分化出来的造反派成立了“洞口工联”组织。这个组织在厂矿发展很快。6月中旬，造反派组织“点火战斗队”进驻县委，进行了夺权的预演，至此，县委全部瘫痪。7月8日，茶铺农校群众组织中的造反派进入茶铺茶场搞打、砸、抢，在进入西瓜地乱摘、砸西瓜时，工人忍无可忍，双方发生纠纷导致武斗。工人钟太山被活活打死，惊震全县（主要凶犯后来受到了法律制裁），该月中旬，江青炮制的“文攻武卫”口号传下来后，以工联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参与了县人武部枪枝弹药的夺取，以后，还有造反派到县委机关和公安局要过枪枝，并两次出动到石江、江口坐卡，防止外地造反派来洞口抢枪，闹得空气十分紧张。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简称《八·十决定》）下达后，因“湘江风雷”问题受压的群众组织及其骨干都得到平反。由于人武部依靠“红总部”等群众组织基本控制了局势，加之很快又公布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消息和指示，强调“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10月，中央报刊又公布了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中央提出要以它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并发出了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等，所以没有引起新的动乱。随着《湖南问题决定》的深入贯彻，流散的枪枝开始收